

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
(1020-1077)

张载的思想
(1020-1077)

[美] 葛艾儒 著
罗立刚 译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英] 杜希德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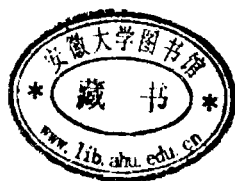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英] 杜希德 主编

The thought of Chang Tsai
(1020-1077)

张载的思想
(1020-1077)

[美] 葛艾儒 著
罗立刚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载的思想(1020~1077)/(美)葛艾儒著;罗立刚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ISBN 978-7-5325-5706-6

I. ①张... II. ①葛...②罗... III. ①张载(1020~1077)—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24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0367 号

责任编辑 马 颢
装帧设计 严克勤
技术编辑 王建中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
张载的思想(1020~1077)

[美]葛艾儒 著

罗立刚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200,0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706—6

B·708 定价:38.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言

本书是关于颇具才华和原创精神的思想家张载(1020—1077)的研究著作,它或许会引起两类人的兴趣,一类人是汉学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张氏哲学思想的专著问世;二是非专业人士,他们或许对中国哲学有些兴趣,想知道一下中国哲人对宇宙以及人在宇宙的地位有些什么想法。 ix

张氏的著作散佚很多,不过,留存至今的还是足以让我们勾勒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他是个乐观主义哲学家,认为人性原本既善且美,而且张氏对于世间诸恶,虽然也曾论及,却不再讲神性和神权,也不讲雅道失落。张氏建构起来的宇宙观,导源于中国的传统概念诸如“气”和“阴阳”,但又有别于其原意。事实上,他这个哲学体系,与其子侄辈程颐、程颢所创的学派相对应,共同开启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新篇章:肇始于此的新儒学运动,那以后便世代代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了^①。

与这个运动相关的思想家,共同建构起一个复杂而又融通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亘古未有。正如葛瑞汉所讲的:“……一个转向中国思想的欧洲人,想要借它来审视自己的哲学传统……似乎得益于宋学要比得益于那些前贤更多一些。”^②可是,新儒学思想内容在西方的传播,并不像先秦思想家诸如孔子、孟子、老子等人的哲学

^① 这个术语,西方学者虽然用得较为宽泛,这里使用它,却是专指中文里所谓的“道学”(研究“道”,见下文000页[译者按:原文如此,依文意当是指第20页“常理”部分相关内容;关于引文页码,请参本书译后记第6条])或“理学”(研究“理”)。

^② 葛瑞汉《中国的两位哲学家——程明道和程伊川》“前言”第4页(伦敦:伦德·休姆夫雷出版公司,1958年)。

那样广为人知。张载,作为宋代早期最有意思的哲学家之一,在任何一种西方语言中,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我认为:我们理解新儒家思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精读其中某位思想家——比如说张氏——的著作。

- x 张氏自视为孔子晚生,而且像孔圣那样有一种挫折感,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没有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不过,在死后的九百年间,张氏却对很多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那篇最负盛名的《西铭》,成了学者们必修课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台湾,学生们仍然对它很熟悉。近年来,大陆上又掀起了一股学习张氏哲学的热潮,所以说,这本书所研究的,是一位生在十一世纪但其著作却至今仍然动人的哲学家的思想。我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当初所促成的哲学运动。

问 题

想要重新建构一位九百年前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当然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张氏的有些著作已经不存于世,保存下来的因为版本不同又常常有许多讹误^①,而且,有证据表明:张氏手订的《正蒙》,那部最能代表其成熟思想的著作,其中大部分是撷取早期的著作编纂而成的^②。如果那些早期的文字得以保存下来,通过阅读原文,对那些后来摘录部分的理解,一般来说应该会更清楚些吧。可是,那些摘自佚著的部分,由于脱离原文,自然难于索解了。

再者,张氏的行文风格,在文字之中或因时间不同或因前提有异,时不时作些简注夹批,这又增加了难度。张氏评论《论语》,对这种方式表现得很有兴趣:

《论语》问同而答异者至多,或因人才性,或观人之所问意思言

① 见下文《附录一》有关参考书目问题的讨论。

② 例如,户田丰三郎就估计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正蒙》内容源自《易说》,参见他的《横渠〈易说〉考》,见《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25号,第1期(1965年),第232页。

语及所居之位。^①

似乎张氏教育别人,也是采取的这种态度,对同样的议题,回答却不相同,以适应各种环境。并且,似乎张氏在《正蒙》中便有含糊的风格,至少是部分如此,作为一种教学技巧,用意在于促使弟子们深究文意,各得其所。在张氏把他的这部著作交给他的弟子的时候,据传他有这么一段名言:

吾之作是书也,譬之枯株,根本枝叶,莫不悉备,充荣之者,其在 人功而已。又如晬盘示儿,百物具在,顾取者如何尔。^② xi

张氏希望弟子们能主动参与其中,熟读之,深思之。他相信,惟其如此,弟子们才能透彻地领悟他张某人想传达的个中妙意。置身现代的学生们,要想研究张氏的思想,当然也要面对同样的挑战了。

张氏的生平资料,现在留存的很少,一般称他曾究治佛学十年,我们对这一段已经不得而知了,这确实是个很遗憾的事。张氏对佛学的领悟,毫无疑问对他的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张氏的著述,大多都难以编年。揆之以理,大约《易说》作于早期,可能是 1057 年左右他在京师授《周易》时的著作^③。《正蒙》则是在他辞世前一年才让弟子们见到,显然是他的最终著述。《经学理窟》作于何时,我们实在难以确知,甚至连它的作者都还存有疑议。跟这部著作一样,《张子语录》的编纂细节、已经亡佚的《论语》、《孟子》、《春秋》注疏,也都是晦昧难晓的^④。

简而言之,问题多多,所幸现存的张氏几部著作,内在贯穿如一,所以我个人认为,以现存著作为基础,也许就可以重新构建起张氏哲学的体系。

① 《张载集》(北京:中华,1978年)第308页(译者按:原文附注:“凡涉此著,皆出页码和行数。”译时略去行数,后面不再说明)。

② 《张载集》第3页。

③ 见下文《附录2》。

④ 同上。

方法与假设

我所用的研究方法,十分直接:从反复阅读张氏著作开始,希望对他的哲学思想有一个宽泛的理解。随即采用简单的标准,选取其中一些主要的哲学概念:他辨析得最入微的,便视为主要的概念。选定这些之后,再把他论述每个概念的所有文字都纂集起来,通过对这些文字作整体上的考察,试着去理解这些概念对于张氏的意义所在。本书第二至第四章,便是如此努力的结果。

xii 采用这种方式,我拟定了一些假定的前提。首先,就像张氏对种种儒学经典所设的假定那样,在不同的著作当中,以及同一部著作的不同地方,“道”只有一个,也就是说,我首先假定张氏的哲学思想是有体系的,而且是贯穿始终的。其次,借助现存的篇章,我们是可以拼绘出这个哲学体系的。我认为,第一个假定的前提,是毋需证明的,第二个假定的前提,是有疑问的,因为我们对张氏的著作,大部分仍无从编年,而且对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又知之甚少。不过,我相信,我们应该借助种种不同的文字,使枯槁的《正蒙》变得栩栩如生。再说,除了对他的思想作修饰订正一事有明显的证据外,并没有证据表明张氏在三十多岁快四十岁开门授徒时所写的著作,跟大约二十年后所纂订的《正蒙》,在思想上有明显的变化。从张氏很可能在手订《正蒙》时大量采摭其早期的论述来看^①,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张氏的著作自成一统,这个假定的前提,无论是明清时期的学者搜辑张氏留存的著述编纂成《张子全书》^②,还是1978年学者们编辑出版《张载集》,至少都是暗含此意的。

我也坚持《张载集》存在哲学体系的观点,本人在这本书中便是想尝试着去阐释它。我希望它能公允地体现张载的世界观。

① 《张载集》第384页。

② 见下文《附录1》。

致 谢

本书是以我的学位论文为基础的,1982 年完成于普林斯顿大学,那里有很多人帮助过我。我首先要向 F·W·莫特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和善而渊博的懿范,在我这辈子当中,可以说是莫或逾之。我还要对裴德生教授深表谢意,我阅读中国哲学原典,便是赖他启蒙,他还全面而深入地审读了论文的初稿。杜希德教授审读了本书的修订稿,并且在出版方面给予指导,对此,我深表感谢。同时,我还要感谢刘子健和唐海涛先生,因为他们给了我有益的建议与鼓励。

xiii

1979—1980 年,我有幸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得到北京大学求学,师从当今首屈一指的张载研究专家张岱年教授。真诚地感谢张教授在百忙当中,慨然抽出时间给予每周面授。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的楼宇烈教授,他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对我多有裨益。

普林斯顿大学众多友人的帮助,实在是让我谢不胜谢。不过,其中有几位我还是在这里简略地提一下。诚谢詹姆士·盖思博士,他真是启我心源,不仅激励我,而且在编辑上给我提出了建议。诚谢凯斯·海兹顿,在本书的制作过程中,帮助我掌握了复杂的 IBM 3081 操作系统,要不然,这本书的问世,恐怕还要迟几个月,而且成本也会增加不少。迈克尔·博特,我的朋友兼死党,在患难之中帮我打理外物。最后,艾伦·爱丽苏芙女士在本书的编辑和精神的鼓励上,给我的帮助真的是相当大的。

感谢上述各位,还有更多没有提到的人。只是我没能全部采纳他们的建议去做修改增补,所以书中存在的任何不足之处,都由我本人负责。

目 录

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

——《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陈珏 1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十一世纪的学术环境 9

 绪论 9

 假定的前提 15

 担当意识 15

 佛教 17

 一贯 20

 常理 23

 宇宙观 25

 圣人 27

 颜子 29

 问题 32

 人性 32

 心 34

第二章 天地 38

2 张载的思想(1020—1077)

绪论	38
气	40
阴阳	49
天	61
神	69
 第三章 人	 76
绪论	76
天性	77
“气”质之性	84
学	89
制服恶的“气”质	89
什么叫学	91
学些什么	95
问题	98
解决之道	98
进入第二阶段	105
知止	106
大“此心”	108
得“自明诚”	111
入室	112
颜回	113
 第四章 圣人	 119
绪论	119
求于“危微”	120
主体：圣人是什么	122
功用：圣人做什么	131

自我形象	136
第五章 结论	144
张载的哲学	144
二程的哲学	148
两大学派的差别	157
程氏学派的胜出	165
后记	170
附录	177
(一) 张载的著作	177
(二) 传记	181
引用书目	185
(一) 中文著作	185
(二) 外文著作	188
(三) 单篇作品	193
译后记	196

绪 论

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分裂和动荡之后,稳定的政治管理体系,在赵宋(960—1279)初期帝王的手中开始建立起来,而且导致了许多方面的发展。比如,因为新垦耕地的播种和新技术的应用,包括一系列早熟稻种诸如双季稻、三季稻的引入和推广^①,使得农业繁荣起来。工业领域的发展进步也有所表现^②,区域特征及区域贸易的增加,实际上已经与商业经济相伴相随了^③。货币流通也在增加,到十一世纪晚期,货币流通量较唐代的最高峰还增加了二十倍之多,政府倡导推行纸币,也是十一世纪前半期的事^④。

文化领域的进步也很大。就文学而言,十一世纪见证了古文运动的兴起,藻饰文风被摒弃,简洁明了的载道抒情文字为人所尚。这时的散文成就斐然,是众所周知的事,再说,宋代作家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且推动了一种新的诗体——词,这种抒情诗体——的发展。有学者曾经讲:“诗中充满摹写和哲思,如此关注日常生活这个主题,如此具有社会意识,在古代中国,实在是没有先例的。”^⑤一批画坛巨匠,借山水来展示其宏图与

① 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载《经济史评论》第9卷第2期(1956年),第200—201页,伊懋可著《中国历史的模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13页。

② 参见诸如郝若贝《中华帝国经济圈的改变:华北的铁和煤750—1350》,见《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第10期(1967年)。特别是第111—124页对十一世纪巨额增长的钢铁、煤炭等行业所作的描述。

③ 斯波义信著,伊懋可英译《中国宋代的商业社会》,《密西根中日文中国历史著作摘要》第2种(安阿伯: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第79页。斯波义信(第49页)指出,某些地方发展起来的特殊行业,如苏州、湖州及温州的漆行,越州(绍兴)和处州的瓷器行。

④ 伊懋可《中国历史的模式》第149页、第155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0页。

⑤ 吉川幸次郎著,华兹生英译《宋诗概说》,见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第五卷第17种(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2页。

哲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始于唐代的瓷器制造,在宋代更趋精致,因为在形状、结构、色彩等方面都有创新。名列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如苏轼(1036—1101)、米芾(1051—1107)以及黄庭坚(1050—1110),都活跃在这个时期。十一世纪时,学者们还撰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有司马光(1019—1086)的著名的《资治通鉴》,欧阳修(1007—1072)的《唐书》和《五代史》等。

2 苏轼以诗寄怀,表达了那时士人们的共同感受:

天下太平日,
人生安乐时。
更逢花烂漫,
争忍不开眉。^①

这是一个乐观的时代,似乎事事都有可能。大家都认为他们可以恢复往日的盛世,缔造出一个当年孔子及其弟子在一千五百年前所描述的理想王国。考以事实,那时确实显现出了一些盛世之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989—1052)、王安石(1021—1086)和司马光,都生活在那个时期,虽然他们没能像他们所描述的那样,恢复往古政治清明的和谐盛世,他们却成了宋代文化的领袖。这种类型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具创造性和多产的一种文化。他们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绘画和书法、史学和哲学,都堪称杰出。由于这些人在文化上的成功,也使得赵宋一朝最负盛名。

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那时哲学的发展,也就是本人所谓的关于人及宇宙的系统性的思考。张载的“关”学,与程颐(1033—1107)及程颢(1032—1085)的“洛”学,在十一世纪后期的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学派^②。两派

① 引自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第27页。译者按:经核,此诗为邵雍《太平吟》,非苏轼诗。

② “关”指关中(“关内”之意),即今陕西省。“洛”指洛阳。虽然他们思想的某些苗头,在更早的思想家那里已经出现了,张氏与二程之间的差别仍然很明显。而且,从事实上看,从早期的思想家开始,便已经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显著差别。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他们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便被认为是新儒学运动的创始人。

各自建构起系统的哲学思想,以解答十一世纪儒士们所究心的各种疑难,形成与此前迥然相别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虽然要确切归纳出导致开启哲学新路的特定的社会、心理与历史成因,是件难事,但是,有几个方面的常见的发展,确实促成了这个阶段的出现。

安史之乱后(756—763),中国进入了一个政局纷扰、军阀割据的时期,与此后的唐朝(618—906)相伴始终。到五代(907—960)时期,仍然是连年鏖兵,彼此混战竟达到了巅峰状态。在这半个世纪当中,短命的地方性“王朝”为继唐鼎,彼此争斗不已。武人乱政,将帅立朝,不少于四次,觊觎而未遂的政变,就更多了^①。最后的一次兵变,是以后周的禁军骁勇赵匡胤为统帅的。那次起事覆亡了后周王朝,赵匡胤开国承统,创立大宋基业,庙号太祖。

太祖的大部分努力,用在了重新清一寰宇,或征战以服之,或遣使以屈之,对新附之地,则巩而固之。为了完成这个大业,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必须的,当然,他也深知其中的危险:一旦武人执政,或者禁军骄纵不受皇帝节制,那就无法加强中央集权了。比如,961年太祖即位之初,便跟宰臣赵普(922—992)说了下面一段话:

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②

所以说,自御极之初,太祖便开始逐渐限制将帅的权力,还进行制度

^① 卫文熙《宋朝的建立 950—1000:军政体制的综合改变》,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104—10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1979年)第二卷,第49页(凡涉此著,即出卷数及页码),转引自卫文熙著作第274页。

上的变革,不再使将帅位高权重,像他本人当年那样威胁皇陛^①。他还关注着戍边将帅,确保他们不至权力大到可以踵武唐代方镇,像那些他们的前辈人一样去割据一方^②。

简单地讲,这些都是宋太祖的遗制。按照宋代的正史记载,就是:“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③这话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也是话出有因。太祖用来训诫那些宋朝嗣君的便是:削夺将领兵权,加强中央集权。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武将,所以在他统治的时期,最终没有能够全面推行这种政策^④。

没过多久,太祖之后即位的太宗(976—998年在位)、真宗(998—1022年在位),面对一统天下的重任^⑤,认识到有着忠君思想的文官政治是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上上之策^⑥。二君御宇四十六年当中,开科取士达九千余人,而太祖在位十六年,仅放296人及第^⑦。而且,太宗还启动了四大学术工程,真宗又再增加了一种^⑧。利用这种手段,使大量学人入我彀中^⑨。太宗喜诗^⑩善书^⑪,于文翰颇具天赋。这种风气在文官中的渐

① 卫文熙著作第173—177页。

② 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卷第77页就有相关的讨论,见卫文熙著作第190—195页。

③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1977年)第四百三十九卷第12997页(凡涉此著,皆出卷数及页码)。参见包弼德《十一世纪中国的道与文化》,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82年,第38页。

④ 卫文熙称:太祖掌控军权的办法,在于明显削弱对地方长官的依赖。“其作为睿智君主形象,对于儒学及其机构则可谓寡恩,恩宠有限并且肤浅”。(卫文熙著作第296—301页)。

⑤ 979年征服北汉,使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局面,那以后收复契丹统治的长城以南辖区的努力,终告失败,1004年,宋辽签订和约。

⑥ 参看诸如毕沅等《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1979年)[以下简称《续通鉴》]卷十一第270页、卷十六第381页(凡涉此著,皆出卷数及页码)。

⑦ 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东京:东洋史研究会,1969年),第449—461页。马端临《文献通考》,见《十通》第三十二卷第304—305页(台北:新兴书局,1965年)。重印《国学基本丛书》本。

⑧ 参见海格《混乱的意义:〈太平御览〉原始》,《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88卷,第3号(1968年),第401页。关于这个学术项目的说法,参见包弼德《十一世纪中国的道与文化》,第41—42页。

⑨ 例如,14人纂《太平御览》,耗时5至6年(王应麟《玉海》[台北:华文,1964年,1967年]第五十四卷,第34页[连续页码第1075页]),而《文苑英华》的编纂,则超过20人(《宋会要辑稿》[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1930年],第五八一八卷第1页上“崇儒五”[编纂书籍])。

⑩ 参见诸如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九十三第12页(连续页码第3636页),《续通鉴长编》第十八卷第393页、第十八卷第413页。

⑪ 《续资治通鉴》第十一卷第267—268页。

趋广泛,至少部分地继承了太祖在抑制军权方面的努力^①。

文治之功,影响可谓深远。十一世纪早期,文官执政,学人通过对经术的稔熟获得社会地位。其中一部分学者转向哲学研究,作为关注的领域之一,希望能从传统儒学经籍中融炼出能为新朝所用的意识形态。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是导致十一世纪的哲学思想迈向新途的原因。印刷术的传播,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印刷术的传播与哲学发展有关,但仍有理由假定存在着联系。首先,书籍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已经变得容易弄到,可是在那以前却比较困难^②。首次雕印儒经,是后唐(923—935)宰相冯道(882—954)所为,直到953年才最后完成^③。988年,国子监印行《五经正义》,1001年,在校勘结束之后,皇帝下令刊布《九经注疏》^④。到十一世纪初,多部典籍都已经刊印。比如: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其他几部史著,还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太平广记》)和重要的古汉语辞典(《尔雅》)^⑤,另外,开封国子监也刊印了多种著作,各州府及书院都刊印过一些著作^⑥。1005年,有士人上奏皇帝,陈述刊刻书籍的重要性,说是:

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每见学 5

① 《续通鉴长编》第十八卷第394页。参见麓保孝《北宋儒学的发展》(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1967年)第2页,及卫文熙著作第305—306页。

② 麓保孝引证印刷术及相关书籍的制作能力,为宋代文化复兴的主要因素。见《北宋儒学的发展》,第19页。

③ 卡忒《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古德里奇增订(纽约:罗纳德出版社,1925年,1955年),第70—72页。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初兴》(巴黎:国家印刷局,美国 and 东方图书馆,1953年),第52—53页。与此同时,就像前朝的作为那样,还刊刻了石经。碑版之一,包括唐代的官方注疏,951年刻成于四川成都,后来无注疏的碑版,1061年刻成于开封(麓保孝《北宋儒学的发展》第15—17页)。

④ 麓保孝《北宋儒学的发展》第2—3页;《续通鉴》卷二十二第515页。五经是指《诗》、《书》、《易》、《礼》及《春秋》与所附《左传》,宋人时或称为六经,上述五种之外,另有《乐经》,在汉时就已经亡佚了。所谓九经,是指上述五经之外另加两种礼书《周礼》、《仪礼》,以及《春秋》另外的两种传《公羊》、《穀梁》。宋人有时又称十三经,指上述九经之外再加上《论语》、《孟子》、《尔雅》和《孝经》。《孟子》跻身儒经,始于1061年国子监所刻的石经。

⑤ 柯睿格《宋初文官制度》,见《哈佛燕京学社专著系列》第五卷第13种(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第18页。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初兴》第86—87页。

⑥ 伯希和《中国印刷术的初兴》第88页。

徒不能具经疏。盖传写不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①

977年,江州知府奏请抄书以实白鹿洞书院,该书院是宋代最著名的书院之一。皇帝颁旨令国子监抄副与之^②。990年,皇帝敕令颁送儒经于全国诸路,供众官研习^③。印刷术的进步,使儒经这个十一世纪儒学复兴的文本要求变得极易得到满足,这是以前所没法比的^④。

另外一个常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因素,这里再特别予以指出。佛教此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了。许多儒学之士都热衷于排佛,指斥它有害于皇权^⑤。跟这同样重要的是,佛学术语及其概念已经成为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一个知识组成部分。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学人们已经知道有那么一个关于宇宙与存在问题的哲学体系,而它对这些问题的说法,根本就不在儒学传统的范畴之内。由于要排佛的缘故,这些人开始致力于探究宇宙、存在和真实性等,这些被早期以伦理为核心的儒学边缘化了的话题。

另外,这当中的许多人又都受了很深的佛教影响,都到了他们自己也觉察不到的地步。虽然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观念是脱胎于儒学传统的,但这当中的关联还是很明显的。比如,程颐曾被问到 he 关于“觉”的思想是否跟佛教的“悟”不一样,他回答说:何必讲浮图呢,孟子就曾谈到觉了。所谓觉悟,他说就是懂得了儒理^⑥。跟他一样的还有苏轼,他曾经记

① 《续通鉴》第二十五卷第576页。这些数字跟其他地方给出的不同,所以不应作字面的理解。参见《玉海》第六十二卷和《宋史》第二百二卷第5032页《艺文志·序》。

② 《续通鉴》第九卷第213—214页。

③ 《续通鉴》第十五卷第358页。道,是宋代最大的行政单位,大致相当于后世的省。997年,全国共分15道。神宗时期(1068—1085)这个数字增加到23。参见温斯顿·罗《中国宋代巡检使和巡检副使对地方的管理》,见《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56—57页。

④ 卡忒曾讲:“经籍的刊印,对于儒学文献的恢复以及国家和民众的训教,在佛学东渐之前,其实是有功效的。而随后的经籍复兴,只可以跟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那也是重新发现经典文艺之后的事了,也是得益于印刷术发明的帮助的。”卡忒《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83页。

⑤ 见下文第14—17页。

⑥ 程颐、程颢《河南程氏遗书》,《国学基本丛书》本,第217页(凡涉此著,皆注页数)。